

永远的驿站

曾纪鑫 著

如何在西方与东方 中心与边缘 解构与建设之间 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呢

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失态 失落 失语的尴尬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 ”
字里面是条虫

跳出门外便是龙。

于是 祖先的停泊地 便成为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有志之士的呐喊与努力遭遇到比西方“船坚炮利”更加坚固厉害的传统保守堡垒 晃悠悠地在夕阳的残照里颠簸前行

清帝国犹如老牛拉着的一辆破车 吱吱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歌谣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永远的驿站



曾纪鑫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驿站/曾纪鑫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6

ISBN 7 - 80186 - 480 - 8

I. 永... II. 曾...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164 号

永远的驿站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1.25 插页 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86 - 480 - 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远的驿站(代序)

曾纪鑫

福建简称闽,唐代以前,一直被视为一块“蛮荒”的化外之地。

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东吴开发江浙,就有不少汉人移居福建。然而,汉人对闽地的真正开发,则源于中原汉族四次大规模移民: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八姓“衣冠南渡”;唐高宗时,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多人南下平叛,进入漳州;唐末五代,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带领中原人马五千入闽,后封“闽王”;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北方民众为避战乱,纷纷逃入福建。除以上四次大规模阶段性移民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逃亡者、流放者、驻闽将士、赴闽仕宦者、投亲靠友者等其他中原人士陆续而来,定居闽地,从未间断。

一批又一批的汉人如种子般遍撒八闽大地,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加快了开发福建的步伐。他们繁衍生息、不断发展,与当地土著居民百越族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对峙、碰撞与交流,已融合为一个难分彼此的整体。

自唐以后,福建文化进入前所未有的兴隆局面。“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据各种统计资料表明,两宋时期的福建,各类人才层出不穷,文化地位已在全国首屈一指:两宋进

士总数两万八千九百三十三人，福建七千一百四十四名，占全国总数约四分之一，全国第一；“福建出秀才”，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九百八十八人，福建一百七十八人，全国第一；《宋史》中进入《儒林传》与《道学传》的学人，闽籍人士十七名，全国第一；《宋诗纪事》所列福建诗人一百二十八位，全国第二；闽人身居宰相之位者，全国第三……对此，朱熹不由得欣喜而自豪地写道：“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

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地，仿佛转瞬之间，就已成为全国经济繁荣、文教昌盛的“文明礼仪之邦”。而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闽学，在整合福建学术文化的同时，更是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将一个地域性学派跃升为凌驾全民族的精神指导思想长达七百多年之久。步入近代，福建的文化地位尤显重要，以林则徐禁烟而直接导致的鸦片战争，不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他为代表的经世思想更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期的到来。“晚清人物数侯官”，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抽去福州的林则徐、严复、沈葆楨、林纾等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实业家、翻译家，将失却应有的开放与凝重而显得黯然失色。

福建居民，多为移民及其后代，他们在军旅游宦之地、避难流放之所驻扎生存，驿站般的停留，竟成为一处永久的家园。他们血管里涌动着的，是中原华夏族的精气神，对文化、文明有着一一种本能的渴求与向往；他们宁可避居偏远闭塞的蛮荒之地，也不愿在专制与强暴的压迫下苟且偷安；他们不甘屈服、奋勇抗争，显得极其另类而反叛，也正因为如此，才永远充满朝气与活力；他们赋予“闽”字以新的内涵，“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于是，祖先的停泊地，成为走向未来的新起点，他们以福建为基地，向更远的地方进发：向其他省份延伸，向台湾移民，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迁移，向欧美乃至世界各地寻求生机，创建新的基业。

然而，祖辈的停留地是那样神圣，无论是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还是从此走出、远在异国他乡的移民，在他们心中，八闽大地，就是一处永远的驿站：置身福建，他们会不时追溯祖辈风雨兼程、迁徙南下的艰辛历程，将先辈的驿站，视为美好的家园；旅居海外，总是于烟雨苍茫中回望魂牵梦萦的故土，寻找精神的寄托，抚慰疲惫的心灵，先辈的驿站，就是永恒的故乡，循着相承的血脉，可以找到中华文明的源头……

2003年3月26日，仿佛呼应一段苍老的历史，我踏上了举家南迁、移民福建的旅程。进入福建怀抱，列车时而绕山盘旋，时而穿越隧道，时而在平坦的山地、河谷、平原滑行，连绵起伏的青山、曲折回环的流水、碧绿坦荡的田畴、依山傍水的房舍，从我眼前一一闪现，又一一消逝。列车由北而南穿越八闽大地，我也尽情领略了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环境与丰富韵致。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便经历了古代也许得需几代人前仆后继才能抵达、完成的迁徙之旅。

由“国中之国”的荆楚大地，移居东南沿海享有海上花园、旅游城市、温馨城市之誉的特区厦门，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同时，我不由得时时想到早年的厦门，是一个偏远得不能再远、蛮荒得不能再荒的海岛，荆棘丛生、虎狼横行、虫豸遍地、瘟疫弥漫、台风席卷，生存环境之恶劣，简直无法想象。于是，对当年的移民与开发，也就更加生出无限的感慨与感佩。

我在故乡湖北度过了四十年漫长时光，身上携带的，更多是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因子。置身新的环境，在不同文化的磨合中，我以厦门为基点，推及闽南文化圈的漳州、泉州等地，再向福建区域的其他文化圈辐射。两年来，我利用开会、出差、旅游及专程探访等方式，差不多走完了我所认为的福建极富文化内涵与典型代表性的山水名胜、历史古迹。行走看似轻松浪漫，却可增加一个人的生命重量；行走产生跳跃与联想，也产生思考与思想；行

走受到方式、过程及目的等多重约束，却能够带来新奇，获得知识，激发灵感，产生创造的渴望……正是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不时跳出有限的地域范围，将八闽文化放在中华大文化的视野中，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深深地感受着福建地域文化别具一格的突出特征——多元性、矛盾性、海洋性。

福建文化的多元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圈的多样、方言的多样、民间信仰的多样、民风民俗的多样以及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代福建，曾经独领风骚且相互更迭的地方文化形态，就有唐代漳州文化、五代闽国文化、宋代建州文化、元代泉州文化、明代月港文化与晚清侯官文化。今日处于同一时空的则有闽南侨台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北理学文化、莆仙妈祖文化、闽东畲族文化及闽中三山文化等。

全国八大汉语方言，福建占了三种，如果算上省际交叉地区，仅福建省内流行的，就有汉语八大方言中的七种。即使同一方言，也会生出许许多多的分支，如闽南方言中就有差异很大的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尤溪话。不同的方言之间，难以沟通对话。在福建连城县，我发现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闭塞的偏远所在，八十多岁的老太婆都能说得一口较为流畅的普通话。询问缘由，说是全县有着三十多种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当为几大方言中的有着诸多差异的无数分支），往往隔着一个山头或一条河流，双方就会产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隔阂。没有想到的是，方言带来的障碍，反而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与流行。

福建的原住民闽越族“信鬼神，好淫祀”，哪怕中原文化占居主导地位之后，这一传统仍保存下来，又有了闽人“信巫鬼，重淫祀”之说。你有你的信仰，我拜我的神灵，各不干扰，相互有别。即使同一县内，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特定的保护神，抬神出游一般也不越出本地界线。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乡有一俗”，是福建民俗的真

实写照。同一民俗在不同的乡村,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闽南惠安女虽为汉族,但她们的奇特服饰与婚俗,使得不少人以为惠安女是某一尚未知晓或归类的少数民族。

福建现有近三十个剧种上演,最有影响的是闽剧、高甲戏、芗剧(又称歌仔戏)、莆仙戏、梨园戏等五大剧种,却没有一个剧种如京剧之于北京、越剧之于浙江、豫剧之于河南、川剧之于四川那样全省流行,更不用说代表福建,走向全国了。哪怕不以方言为载体的艺术形式如舞蹈,也难为全省民众普遍认可,如流行于闽南地区的拍胸舞、宋江阵、大鼓凉伞、彩球舞等,在其他文化圈就无法找到知音。

闽山苍苍,有“东南山国”之称,丘陵山地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0%;闽水泱泱,河流众多,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等二十九个水系六百三十三条河流,总长多达一万二千八百五十公里;河流与山脉或平行,或垂直,形成密密的格子状网络,将福建分隔成几个不同的自然区域,每一区域又因山脉河流走向的不同分割为若干小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座山岭都是交流的障碍,每块谷地都可构成封闭自足的天地。中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分期分批进入福建不同地区,与本地固有的闽越文化,外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杂交融汇,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不同形式。家族与家族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与移民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在长期独立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块划地为牢的地盘与势力范围,稍一越界,就会爆发你死我活的争斗,由此带来了福建历史上大规模械斗的持续不断与“长盛不衰”,这也是形成八闽文化多元性的内在缘由之所在。

除多元性外,福建文化的底层里,也透出诸多自相矛盾的两面性。

山地的封闭性、保守性、顽固性,与沿海的开放性、开拓性、灵活性仿佛两重不同的天地,形成一种极其鲜明的对比与反差;即

使同一地区,也体现出自相矛盾的文化性格,厦门的“闽海雄风”如开放豁达、从容大度、勇于拼搏,与无法掩饰的内在惰性如安于现状、节奏缓慢、收缩内敛,就显得极不协调;福建历史上诞生了奉为第二“圣人”的理学泰斗朱熹,也出现了反理学、反儒教的一代狂狷李贽;无数八闽女子囿于“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思想的束缚,以美丽的青春与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额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牌坊,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福建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无数男子拜倒在海洋专职女神妈祖的偶像与灵光之下……保守与开放,愚昧与智慧,传统与西方,封建与启蒙,虔诚敬服与另类反叛,固步自封与锐意进取,都曾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展示各自的个性、特色与顽强。

福建濒临大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天然良港,海洋性是内陆居民难以真正感受与深刻体会的。只有移居厦门,在既咸涩又和缓的海风吹送与浸润中,我才深切地体会到海洋的博大与深邃,领悟到海洋文化的深厚内涵,体会到蓝色海洋对一个民族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古人早有“闽在海中”之说,然而,这一指陈并非说明我们的先民如何充分地利用海洋、走向海洋,而是阐述福建孤悬海外,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化外之地。直到宋代以后,中国古代的航海业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然而,福建的海洋文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海洋蓝色文明。“海者,闽人之田也”,明人顾炎武所言,既道出了闽人以海为田,在滨海、岛屿从事海洋采集、捕捞活动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古代福建民众对海洋的利用与开发,仅仅局限于海洋农业,没有很好地在远航、商业、贸易等领域走得更远,获得更多的发展,取得更大的作为。福建海洋文化,只能算作滨海文化或曰近海文化,是黄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一种延伸。然而,福建以一种得风气之先的开放态势,迎接了近代西方海洋文化的到来,从中吸取了许许多多的

内在精髓与有益养分。因此,闽文化实则是从中原而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闽越文化,以及外来的西方海洋文化相互碰撞、磨合、融汇的结晶。

通过海洋走向世界的中国民众,以福建、广东人居多,其中又数闽南人、潮汕人为最。据有关资料统计,福建拥有一千多万海外侨胞。即以台湾居民而言,就有百分之八十为闽南人,他们是福建闽南移民的后裔。闽南与台湾之间,构成一种地缘近、血缘亲、史缘久、语缘通、俗缘同、文缘深、商缘广的特殊渊源关系,为两岸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福建沿海经济能在短时间内腾跃起飞,就是昔日海洋文化、海洋经济的一种延续与回响,是祖先荣光的返照与回应……

一边行走感受,一边研读创作,在近两年断断续续的累积中,就有了收入本书的十五篇大文化散文。这是我继《千秋家国梦》后又一部研究、描写地域文化的专著,只是本书的对象,已由《千秋家国梦》中的故乡湖北荆楚,变成了现在的生活工作之地——福建八闽。其中有人的描述,如土生土长的福建名人朱熹、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与八闽大地密切相关的代表人物郑和、瞿秋白;也有物的状写及事的记叙,如通过莆田湄洲岛描写妈祖民间信仰及传统海洋文化,以崇武古城叙写戚继光抗倭,由马尾船厂勾勒中国近代船政文化及中国海军发展的蹒跚步履,通过古田会议纪念馆描叙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壮大……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福建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

毕竟,我的生命融入福建的时间是那样短暂,行走与阅读、思考与识见又是那样地有限,面对积淀丰厚、内涵深邃、神奇美妙的

八闽大地,我呈献给读者的,不过是打开了一扇认识福建的窗口而已。关于福建,还有许许多多新的课题等待我们去挖掘与研究,特别是与福建密切相关的海洋文明,更是激发了我浓厚的兴趣。海洋文明推动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国的近代文明始于沿海,中西文化的结合也由沿海而深入内地,辐射全国。海洋正成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海洋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海洋文化,实质上就是现代文化与世界文化,海洋强国也是世界强国。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向海则兴,开海当盛。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海洋的世纪,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未来。而我们面对海洋,自古以来都是从陆地的角度出发,以陆地为中心,在黄土文明及农业文明的框架中兜圈子。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海洋的角度了解海洋,由大海的视角看待陆地,从西方蓝色文明的视野认识中原大地的农业文明、北方草原的游牧文明以及东南沿海的近海文明等中华文明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当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也许,这就是我下一步将要创作的内容。

2005年6月3日深夜于厦门市太子山庄

目 录

永远的驿站(代序) / 1

崇武古城 / 1

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 23

民族英雄郑成功 / 53

世纪侨魂 / 79

封闭与开放的土楼 / 105

走进四堡 / 123

星火与太阳 / 140

真实的灵魂 / 159

睁眼向洋看世界 / 181

起点与归宿 / 210

蹒跚的步履 / 236

心中的妈祖 / 256

郑和的悖论 / 280

思想家李贽的生前死后 / 306

多维视野中的朱熹 / 329

崇武古城

提及南京大屠杀,我们控诉、谴责日军的丧失人性与施虐残暴,无疑是对的,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自身的逆来顺受与柔弱不争呢?

据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回忆,三千多名中国人被关进一间大货房,只有三名日本士兵看管。房门大开,而关押的中国人又都没有捆绑,却一个个吓得动都不敢动弹,更不用说反抗了。结果全部被杀害,这位回忆者是其中惟一的侥幸逃生者。

3:3 000,也太不成比例了。

然而,还有比这更不成比例,更让人丧气的。迟浩田将军曾感慨,抗日战争时期,七八名日兵端着四五条步枪,扛着一挺机关枪,打着一面太阳旗,竟在他的故乡山东招远县(今招远市)四处“扫荡”,横行无忌,将全县几万名百姓赶得鸡飞狗跳,到处“跑反”。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其他地方也有,并且相当普遍,只不过少有人描述、统计而已。

即使杀一条喂养的老牛,宰一头温驯的绵羊,在捕捉它们时

也会奔逃,或是利用身上惟一的利器——牛角或羊角拼命一搏,更何况动物之灵长——人呢!

平民如此,而我们的军队呢?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常以1:7的比例制订作战计划。仅以日军板垣第五师团为例,它在整个侵华战争中对付七十多个中国师,不是全歼,就是击溃。

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不是这样。我们有过汉唐雄风的阳刚,有过泱泱大国的恢宏,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有过奋勇抗争的血性……

然而,我们的偏安一隅、萎靡不振、卑怯懦弱、柔顺不争、温驯服从,却又是无可辩驳、难以否认的事实。

中华民族何以一变如此?这种巨变始于何时?

日本人的强悍与凶残并非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而我们的软弱与涣散也非一朝一夕形成。翻拣历史,一则史料曾让我触目惊心,感慨万端,永难忘怀。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六月,百余名倭寇在浙江上虞县境登陆侵犯,一路抢劫,横贯浙江后,剩下的六十多人继续深入内陆,西进安徽,再犯明朝陪都南京,不克,又穿越无锡奔袭苏州,至太湖附近才遭围歼。区区倭寇,竟深入国境三省二十几县,杀掠数千里,打死打伤中国军民四千多人,历经八十余天,才被彻底剿灭。而在倭寇奔袭的地带,军民人数之多实难统计,仅南京一地的驻军就达十二万,却令数十名倭寇如入无人之境。

梳理变因,探究根由,并非本文主旨。既然引出了这样的话题,也就提纲挈领地稍作勾勒。

北宋为一大变,开国皇帝赵匡胤因“黄袍加身”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为防止类似事件出现,倡导国民重文轻武。他不仅以文官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当重文轻武成为时尚时,柔弱之风也就从上到下地侵入社会底里,改变民族的气质、素质乃至本质。

宋代的重文轻武与柔弱不堪,引来蒙元铁蹄的践踏蹂躏,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蒙元瓦解,明朝建立,又有八旗入关,满人清朝长达近三百年的压迫。两次异族统治,汉人都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心怀不满,也有过反抗,可脑袋硬不过钢刀。好死不如赖活着,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不思进取地活着,仅为活着而活着而已。当这种“活命哲学”发展成为民族的主流时,精神萎靡、胆怯畏葸、柔弱顺从、人格卑微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严重痼疾。因此,每一次异族统治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就是民族的阳刚之气与正义之风大打折扣。

当然,哪怕积贫积弱、萎靡涣散之中,我们的民族,也有崇尚阳刚、振兴武备、克敌制胜的闪光与辉煌。

崇武古城,就是进入我视野的一个亮点。

崇武崇武,崇尚武备。仅“崇武”二字,就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一种久违的亲切在心中涌动不已。

崇武古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久远,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只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然而,它却是我国仅存的一座比较完整的石头古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更有不可计数如星辰般散落各地的城池城堡,迄今保存较好的有陕西西安城、湖北江陵城、山西平遥城、辽宁兴城、山东蓬莱水城等,这些古城的城墙皆为砖块建筑或泥土夯筑,惟有福建崇武古城,城墙全部采用花岗岩石砌筑而成。

崇武古城,位于福建泉州市惠安县东南崇武半岛南端,西连陆地,三面环海,东临台湾海峡,夹在湄州湾与泉州湾之间。崇武近处海域遍布礁石岛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一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要塞。

我国古代国防史上,历来以剽悍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为患,他们不时南窥,掳掠中原,来去如风。万里长城,便是对付北敌威胁、入侵南下的一项庞大而系统的防御工程。到了明朝,前期要

抵御北方内犯的蒙古鞑靼、瓦剌骑兵，后期得防备东北新兴的后金（满清）军队，而东南沿海一带，也燃起了战争的烽火，那就是愈演愈烈的倭寇侵扰。

明朝的国防，除了历朝历代延续不已的北虏之患，又增添了南倭之虞。

崇武古城，便在这样的国防背景下“应运而生”。

为防御倭寇侵袭，朱元璋下令海禁，并于洪武初年（1368年）开始在东南沿海设置卫所，建立水军。洪武十七年，派大将汤和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带修筑了六十来个军事据点。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派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增建十几个，北起崇武，中经永宁、金门、厦门，南至铜山（今东山）。于是，短短的四年间，朱元璋便在东南沿海新筑了七十多个军事城池，它们互为犄角，互相呼应，筑起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海防长城”。

崇武古城建造之初，不过是这逶迤绵延的七十多个军事据点中的一个，是朱元璋与刘基共同构想施行的海防长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其他海防城池的衰落与毁弃，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惟一历史见证，享有“抗倭名城”、“英雄古城”之誉的崇武卫城，也就显得格外突出而高大了。

二

所谓的倭患，并非日本与明朝两国政府间的敌对与征战。明朝建立之初，正是日本分裂为南朝与南北朝的内乱之际，也不可能对明廷形成对抗。而在明朝眼里，日本不过是四方蛮夷中的一个而已，是天朝的一个附属岛国。于是，在不了解日本国内已有天皇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册封当时执掌实权的幕府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

从古至今，我们总是以一种文明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